

D U S H U W E N C O N G

读 书



文 丛

# 往事和近事

葛 剑 雄

## 序

自从我的第一本专著《西汉人口地理》在一九八六年问世以来，大大小小的书陆续出了几种，却没有想到过要出这样一本并非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集的书。承《读书》编辑部好意，促使我选出近年来发表过的、或将要发表的二十几篇文章汇编为这本集子。在即将出版之际，似乎还应该写上几句话，作一开场白，我想还是将它们的来历略为作些说明吧。

这些文章内容很杂，只能大致分为五组：第一组是几篇与我的专业中国历史地理和我近年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有关的文章，大致按题目的大小排列。第二组的九篇是读历史书后写的札记或感想，按涉及的事件或人物的先后为序。第三组是对季龙（谭其骧）先师和杨联陞老师的回忆和怀念。第四组的内容是对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教育、人才、知识分子、人文精神

——发表的一些意见。最后一组谈的是人口、移民与环境，也是世人瞩目的问题。这些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是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其余大多是这两三年间发表在《读书》、《东方》和上海一些刊物上的，也有几篇是尚未发表的。选编时仅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文字改动，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让读者能看到它们的原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感到它们依然代表着我现在的看法、观点和感情。

我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近十多年来的研究集中在人口史、移民史和历史人口地理方面，还参加了几项国家科研和文化项目的工作。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指导研究生也是我的本业。这些“业”，我倾全部精力犹恐不足，是很难有“余”的，何况我是三十三岁才开始学业的，所以多年来已很少有什么业余的时间了，在一九八九年前我基本上没有写过论文和专著以外的文字。这一年，我写的一本小册子《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年后，我又写成了《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两本书的印数远在我其他学术专著之上，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的反应之大也出乎我的意料，我所了解的读者至少包括理工科大学学生、公司职员、农村知识青年、港台和海外华人，美

国、日本、韩国的学者，还有一位挚友当时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写法注意了适应非专业的、年轻的读者的需要。这促使我考虑一个问题：怎样使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取得的科研成果、写成的学术专著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什么不能让这些成果在为专业人员利用的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所知所用呢？

因此，我对移民史和人口史这两个项目的成果作了这样的计划：一套二三百万字的多卷专著、一本三五十万字的专著、一本十来万字的普及性小册子；前者已基本完成，后者正在进行。此外，我还不时将自己读书和研究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写成供大众阅读的文字，这就是本书中多数文章的来历。《读书》等刊物不断增加的订户给这些文章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使我听到了不少在校园和书斋中听不到的意见，这又刺激了我新的写作欲望。而脉望兄的不断诱导或催逼，最终使欲望变成事实。

文章自然是有感而发的，只是我的视角往往出于历史，是从历史看现实。这或许是一种优势，或许正是一种局限，反正已经写出来了，不妨由读者们评说。友人曾戏问我是不是要搞影射史学，我断然否认。也有人要从我的文章中寻找有何微言

大义，我觉得即使他们能发现，也未必是我写文章时想到过的。如果把历史比为镜子，所谓影射史学就是在镜子上抹上颜色，或者破坏镜子的平面，使人们照不到自己的原貌。而我想做的，是擦去蒙在镜子上的灰尘，使镜子更加平整，至于照出来的尊容如何，跟我是毫不相干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恰似一个齐全的字库，智者可以找到一切需要的文字，随心所欲地写出文章；愚者只能望之兴叹，反而会责怪字数太多，一旦发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文字，不免要怀疑编造者的别有用心。

就在几天前，我收到了一本由钱谷融、陈子善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等蓝色沉入黑暗》，其中竟收了我怀念季龙先师的《悠悠长水》一文。我想，编者看中的绝不是我的文笔，而是文中所记先师的嘉言懿行。在收入本书的文章中，除了直接记述先师言行的几篇外，还有几篇也是在先师的教诲或启示下写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评论的文章不止一篇，但先师认为对《图集》编绘的理论根据仍阐发不深，鼓励我另写一篇，这就是《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一文的来历。一九九〇年我们在上海举行庆祝先师八十寿辰的学术讨论会，我的报告就是这篇文章。《古来北京

知多少》一文最初是我的一则读书笔记，由于我发现的几则称北京的例子是先师原来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所写“北京”一条所无，他在赞许之余就将它推荐到《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上发表，又命我写成补白，刊于由他主编的《历史地理》上。先师对冯道的评价使我重新翻阅了有关史料，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以后写成《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我曾向先师禀告对骊軒县得名的分析，得到他的肯定，使我在写《天涯何处罗马城》时有了更大的把握。遗憾的是，他没有能看到这两篇文章，更没有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开始编集子时就在考虑用什么名字，拟了一个“往事和近事”，并不十分满意，却又想不到更好的。不过，这个名字有个很大的好处，用个时髦的词就是“模糊”——从古至今，又有什么事不属于往事和近事？或问：既以往事和近事并列，两者区别何在？答曰：这只是就笔者写文章而言，已成历史的是往事，还在进行的即近事，介乎两者之间的不就是往事和近事吗？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 目 录

|     |                    |
|-----|--------------------|
| 1   | 序                  |
| 1   | 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          |
| 16  | 炎黄子孙之我见            |
| 32  | 长城的价值              |
| 40  | 天堑何曾限南北            |
| 50  | 古来北京知多少            |
| 60  | 天涯何处罗马城            |
| 75  | 永恒的矛盾:追求与现实之<br>间  |
| 96  | 汉魏故事:禅让的真相         |
| 123 | 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br>祭  |
| 144 | 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br>其事 |

|     |                      |
|-----|----------------------|
| 162 | 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         |
| 183 | 重读《明史·海瑞传》           |
| 196 | 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            |
| 219 | 世界上不止有中文             |
| 231 | 悠悠长水                 |
| 248 | “开风气者”与“为师者”         |
| 270 | 浩劫中的忘我追求             |
| 276 | 长水琐忆                 |
| 282 | 最忆康桥风雪时              |
| 288 | 科举、考试与人才             |
| 299 | 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主人<br>意识   |
| 309 | 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            |
| 315 | 国以人兴,教以育人            |
| 322 | 中国人口:二十一世纪的忧<br>思和希望 |
| 334 | 移民·移民文化·上海文化         |
| 357 | 从移民史看民工潮             |
| 374 | 环境保护的人道原则和乐观<br>精神   |



# 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

自从班固编纂成第一部断代史以后，传统的史书都是以中央王朝或某一政权为体系的，反映在地图绘制上也是如此。直到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出版《历代舆地图》，也只反映历代中原王朝，而不包括边疆地区的非汉族政权，尽管这些地区早已是清朝版图的一部分。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史学家大多已经注意到并在实际上打破旧的王朝体系，但如何确立新的体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如何理解和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就是其中一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一种意见是以今天的中国领土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根据这种看法，凡是在今天中国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的疆域区划都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否则就不算中国。但是最大的矛盾是：今天的中国领土比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的清朝已经减少了一百多万平

方公里,其中包括一二千年前就已受中原王朝行政管辖的地区。如果根据这一原则画地图,连一幅清朝的疆域图都画不完全。同样,历史上不少中原王朝的领土也无法复原。这种观点还会引出一种奇怪的逻辑:似乎汉唐时中原王朝与朝鲜、越南的关系一概均为“国际关系”,而置这两国当时曾经是中原王朝正式行政区域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另一方面,历史上在今天中国境内一些实际独立于中原王朝的政权或自治地区却又不得不解释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似乎中国的疆域自古以来就是那么大,二三千年来一成不变。

另一种意见是以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及传统史家承认的地区性政权为历史上的中国。对中国今天一些边疆地区,为了证明它们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只能寻找它们对中原王朝的“归属”关系,不管是名义上的臣服,或者是打着“朝贡”旗号的贸易,甚至是中原统治者或学者一厢情愿的宣称,都列之为“历史证据”。而且为了突出“自古以来”,不得不求助于一些早已被证明为并非信史的“文献记载”。尽管如此,还有的地方连这样的“证据”都找不到,于是就会感到理不直,气不壮。

这两种意见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虽然不同,

但都没有摆脱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影响，不承认历史上中原之外的，非汉族政权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因而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五十年代末，当决定编绘一部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国历史，包括边疆的和非汉族政权范围在内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如何确定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就成了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如果说在编写论著时还能有所取舍或详略的话，绘制地图就不能有丝毫含糊。

图集最终确定的原则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又确定：“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谭其骧主编，共八册，中国地图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对中原王朝超越这一范围的疆域，同样保持其完整。

根据这样的原则，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无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边疆，都得到了反映。分裂时期自不必说，即使在传统的“统一”时期，也画出了境内同时存在的各个政权，如西汉时的匈奴，东汉时的鲜卑，唐时的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明时的亦力把里、鞑靼、瓦剌。有些民族还没有明确的疆域或政区，有的虽曾有过却已经无法查考，也在各时期的总图中画出了它们的地点和大致范围，如西汉时的鲜卑、乌桓、夫余、肃慎、以羌，东汉时的挹婁、沃沮、高句丽，唐时的靺鞨、室韦、葛逻禄、黠戛斯，明时的叶尔羌、土鲁番、鞑靼土默特部。对上述第一类政权，同样选择它们历史上稳定的、有代表性的或最大的疆域入图，如吐蕃即以公元八二〇年（唐元和十五年）为标准年代，显示了它北至天山山脉，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东到陇东、四川盆地西缘，西至帕米尔高原这样广阔的领土。同时对中原王朝的版图也作了完整的描绘，如西汉的郡县东至朝鲜半岛中部，南至今越南南部；唐朝的辖境一度北至贝加尔湖以北，西至咸海；元朝的岭北行省直抵北冰洋，辽阳行省东临鄂霍次克海；都未受今国界的局限。对于历史上一度归属未定或不明确的地区，《图

集》采用了不画界，用着色示意或为两不管地带，或为双方势力交错地带。还有一些地区，尽管一直没有建立地方政权（或者至今没有发现），却是由当地民族自己经营的，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归属于中原王朝或其他的政权，如十七世纪以前的台湾，《图集》也如实作了反映。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图集》每册及每个图组都以“时期”划分，而不是以朝代；所以“时期”前的朝代名称只代表它的起迄时间，而不代表它的疆域。只是为了适应读者的习惯，才没有直接使用公元年份。

因此，《图集》在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以及在此范围内的各个政权、民族的关系时，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为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过程；既显示了汉族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也证实了少数民族对边疆的扩展和巩固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统一逐步扩大、逐步巩固，开发逐步深入、逐步稳定的基本趋向。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论著能够如此完满地解决这些问题。《图集》所确立的有关历史上的中国的观念以及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

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

《图集》的编绘始于五十年代，定稿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修订并正式出版于八十年代，尽管它是一项由学者们集体进行的科研项目，但不能不涉及政治立场、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尤其是边界（包括历史上的）、民族这一类敏感问题。我们毫不讳言，只要还有国家和民族存在，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应有荣誉和利益是极其普通而正常的行动，史学家也不必例外。问题是应该怎样做？这种荣誉和利益又应该有什么前提？在这里笔者不想讨论过于复杂的史学理论，也不想对诸如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或历史如何为政治服务一类争论发表意见，而只想把事情简化或集中到最根本的一点：在编绘《图集》时作者应该如何显示或表达自己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

在《图集》的内部试行本（一九七五年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出版）中有几个很典型的例子：

《图集》编绘中有一个“标准年代”的规定，即对某一时期某一政权的疆域政区，必须选择一个

具体的年份或不太长的若干年间，图上的内容应以当年或当时的实际态势为准。但内部本的一些全图，各边疆地区所画疆域或政区往往不是同一个年代。最常用的做法是把一个政权尽管不是同时却都曾经占有的东南西北领土集中在一幅图上，拼凑成从未存在过的“极盛疆域”。

本来，根据《图集》对历史中国的定义，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间的界线是中国内部的界线，与政区界无异，但在实际处理时，却往往会扩大中原王朝的范围。特别是在有长城存在的时期，更绝对避免将边界与长城重合，如西汉和明的北界都要划在长城以北，而置史书中以长城为界的明确记载于不顾。

《图集》的设色原则是：凡属历史上中国范围的用较深色，邻国用淡色。中国内部则同一政权用同样的颜色。内部本从秦时期开始，就将台湾岛画成与大陆上占有今福建的政权同色。但是直到明朝，无论是总图还是分幅图，都还没有注明台湾岛上有什么政区建置。

对比修订后的公开本，人们不难发现这三个例子的变化：1）每一幅总图本身都根据同一标准年代编绘，以显示该年的实际形势。一个时期可由

不止一幅总图反映前后变化,但同一幅图严格按同一年代绘成。2)对确实以长城为边界的时期或地段即按实际画出,对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之间、汉族政权与非汉族政权之间的界线也完全根据历史事实。3)台湾岛始终用与邻国不同、而与中国一致的较深色,但从秦至明均不与大陆同色,至清代设府后才与大陆用同一颜色。

这些改变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十分复杂;但实际上却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以台湾岛为例,人们已经习惯于强调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对《图集》内部本的画法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却没有很好地考虑“自古”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反,对任何即使是很正确的修正或改变都怀着恐惧,唯恐有悖于“爱国主义”,或者会引出什么“政治问题”。对十年“文革”记忆犹新的人更是心有余悸,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有关台湾岛的历史事实是很清楚的。一方面,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人员来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很早就已开始。另一方面,台湾一直是由当地的民族自治的,直到明朝后期才由大陆的“海盗”建立自己的政权,直到十七世纪后期清朝才在台湾岛的西部设置隶属于福建



省的台湾府，以后才将行政区逐步扩展到全岛。台湾当地的民族（我们称之为高山族）开发并治理了这个岛屿，而 这个民族以后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她的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这个岛屿当然就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在台湾归属于清朝之前，没有任何外国拥有过它的主权，一度占有台湾部分土地的外国侵略者已被中国人民赶走。只要如实地反映这一段历史，就能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同时也说明了台湾人民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反之如果一定要归属于汉族的或中原的政权才算属于中国，那岂不是将汉族或中原当作中国的唯一代表了吗？

《图集》的实事求是精神还体现在对一些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如何处理上。例如对秦朝象郡的位置所在已经争论了几十年，或以为大致在今中国广西省，或以为在今越南境内。主编谭其骧先生赞成前者，《图集》就将秦象郡画在广西。一些人误以为这是受到当时中国和越南友好关系的影响，所以在越南挑起两国纷争以后就提出应该改用另一说，将象郡画到越南去。谭先生认为，学术观点不应受现实因素左右，既然广西说比较合理，目前又没有新的证据可以推翻此说，就不应改动。